

末代才女文化之風華再現

沙 培 德*

書 名：*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作 者：Susan Mann

出版時地：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2007

頁 次：322 + xvi pp

明清時代士紳門第出身的「才女」在詩詞、刺繡、以及書法等才藝出眾是有目共睹。她們在家主持家務，在外廣結人緣。然而，這些才女卻被人遺忘在時間裡長達好幾個世代，而等到清朝快要滅亡之時，她們就象徵著舊世禮教的遺毒。她們被看作是 20 世紀「新女性」的反面代表，而非前身——只有「新女性」才能在政治上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為經濟做貢獻，並協助改造社會。而 Mann 的這本傑作正好躋身於這波挽救才女軼史免遭歷史埋沒之著作的行列中。Mann 此書焦點是放在常州張氏家族三代女性的故事，她們在 19 世紀歷經乾隆朝的腐敗統治、各國的進侵、太平天國在世紀中間的全面叛亂，到最後清朝的崩潰瓦解。

試問歷史學家何以能夠撰寫家族傳記？Mann 這本最新著作研讀起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並不太類似 John Galsworthy 的小說 *The Forsyte Saga* 所留給人的深刻印象，不過也相差不遠了。*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之所以是傑作，有兩個主要因素。第一，它讀起來讓人欲罷不能，這歸功於 Mann 在故事的「場景安排 (“scene setting”)」與小說構思上所下的工夫。Mann 運用一種很少歷史學家敢於嘗試的方式：編造對話、服裝擺飾的細節描寫、甚至於述說出主角的想法等等，將之清朝末年的江南士紳世界，重新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她將人物傳記與歷史分析，做了交錯式的章節安排。第二，Mann 前所未見地將中國士紳家族幾個世代當中其女眷對於捍衛延續家族地位上所扮演之絕對性的關鍵角色，凸顯了出來。她文中認可了清末社會地位是變動不定的觀點。大部分的士紳家族缺乏那種足以維持家族於不墜的財富。因此，他們必須代代一再地打造他們的地位，深怕他們的地位就此一蹶不起。Mann 點出，士紳家族女眷及其女性友人之間所建立起的手帕關係，以及受過教育之女性的收入狀況，都關係著家族地位的延續。Mann 此書的研究大多是以常州張家女眷的出版作品為依據，譬如詩詞及其作品中的序文、評述、跋等等。Mann 於是才能夠將張家的生活各面、家庭關係，以及他們的希望所在、失望落寞、奮鬥掙扎與功成名就等等的情狀重建出來。

Mann 書中的第一位主角人物是嫁予張琦為妻的湯瑤卿。他們居住於當時介於鎮江與無錫之間大運河上的一個大城市——常州。湯氏自幼從習著重中國婦德的傳統教育於其父親。而這麼一個態度保守的父親，並不太鼓勵湯氏太早展現她詩詞寫作天賦。湯氏便轉攻刺繡來展現自我。張琦的仕途起步較慢。他的青壯年大半是在外地生活。他曾有一度在外好幾年都沒有負起家中的生活開銷，也很少給家裡捎信（沒有跡象顯示他曾捎過信給他所極為敬愛的夫人湯氏，這點倒讓人感到不解，所以 Mann 要是能解答此一疑團，對文章會大有助益的）。張琦除在私塾授課，還兼為人看病，並且也在準備科舉考試，而湯瑤卿則獨自一人擔起養家和教育孩子的責任。Mann 從研究的蛛絲馬跡中找到了湯氏靠著賣她的刺繡、將私房嫁妝放貸給親友生息、以及其他女性家屬的饋贈等等來過活的事證。湯氏一家吃的經常是粗茶淡飯，但她仍設法以應有的禮度

來接待來訪的重要人物，以維護家族的門面和活絡人脈。張琦終於在 1814 年考取了舉人，此後除了偶而在家小住幾天之外，他依舊沒有回歸鄉里。直至 1824 年，張氏（年屆六十）才被正式授職為山東知縣，從而將全家接了過去。他們夫妻倆前後生了一個兒子但早夭、四個女兒以及最後再生了另外一個兒子（Mann 提供了一個極為詳盡的家族譜系）。張琦證明是一位清廉的好官，雖說清廉不能當飯吃（往後他的兒子入仕亦承繼其清廉之志）。

我以上關於此書的大要說明，很難充分道盡 Mann 所敘述的張家克勤克儉的雋永故事。而此故事的場景就發生在特別重視女學的江南重鎮之一的常州。基本上，Mann 指出，讓女孩子多念點書對沒有穩固財富的家庭來說是利多於弊。而有唸過書的婦女結婚之後，當丈夫在外地工作時，就可以負起教育自家兒女的責任，不用花錢聘請外人來教。此外，常州當地的婚俗可以接受男方以女方家族為重的婚姻生活。新娘子往往跟她自己的父母或母親娘家的親戚生活在一塊，雖然她們可能在幾十年之後才搬離而回到夫家住。這樣的地方婚俗不但無損於男方在傳統禮儀的父權地位（正因當地的新嫁娘一切仍都以夫家為貴、冠夫姓以及恪守夫家家訓），實際上還多增添了一個家族做後盾。士紳夫妻來往的對象與社交範圍，往往與其個人的風雅喜好相表裡。

Mann 書中的第二位主角人物是張琦和湯瑤卿的大女兒張縉英（1792-1863+）。張縉英往後會成為 19 世紀最有名的女詩詞家之一，與她的妹妹齊名。她在 20 歲時下嫁當時尚未中舉但往後會有功名的一位鰥夫吳贊，但是張縉英婚後繼續留在娘家她母親與弟妹的身邊，而吳贊厥後也移居山東住進其岳父張琦的衙門與她們在一起。張縉英 1829 年跟隨吳贊移居北京，接養前房的遺腹子，自己當家，而且很快地就打進女詩詞界。張縉英並不是足不出戶的婦道人家，她十分關注清朝與英國的鴉片戰爭，以及厥後讓她既痛恨又害怕的太平天國之亂。一個令人玩味的問題是，是否北京的環境要比留在江南更能激起張縉英的政治熱忱呢？張縉英的弟弟張曜孫，即使他人正忙著參與對抗太平天國圍剿行動，他依然想辦法集結了他的姊姊張縉英、其他姊妹、父母親、以及他自己的絕

大部分的詩詞作品等等出版以爲保存。

張縉英及其弟妹的故事，是此書所描繪最詳盡生動的部份，而 Mann 的第三個主角王采蘋 (1826-1893) 相對就顯得不盡詳實明晰。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詩人與書法家的王采蘋，是張縉英的妹妹張綸英的女兒。而自幼也是才華出眾之才女的采蘋在她的生母、姨娘與舅父張曜孫身邊成長。Mann 表示，王采蘋有可能就是因爲大姨娘張縉英的關係才開始對英國強行在中國傾銷鴉片的問題抱持關切的態度。爾後，王采蘋的詩作便帶有政治的色彩。當她的丈夫死於對抗太平天國的戰役中，她就當起了女夫子而開始在夫家親戚的府第裡開班授徒。她一生歷經了喪夫、喪失所有親人且膝下無子，並在一個賞識其才學的高官府第裡任教。

Mann 此書將對歷史的分析與人物傳記做了結合，但是 Mann 並不以爲她已完整地重現過去女性的聲音 (第 169 頁)，尤其是僅僅能從她們所出版的十分有限的詩文與自家內弟們所作的致辭、序、跋、評論與出版資料等等來重建她們的過去，雖說這絕對無法囊括關於她們所有一切的觀點，但有一點很清楚的就是，她們都具有堅忍不拔、樂善好施、寬恕待人等人格特質。而至少從她們的詩文表白上可以看出，這些女性人物大致所反映的正是一種傳統婦女美德的觀點。或許，這是因爲中國女性的聲音受到了傳統教條中男尊女卑觀念之影響所致。不過，Mann 點出了一個重要的例外：即在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之亂期間出現的政治詩當中再重領風騷的女英雄人物 (此容後再稟)。

我們光從張家女眷的寫作就可以了解不少關於她們的事情。而 Mann 卻至少能夠運用了一種印象主義式的方式，由淺入深地將詩文所潛藏的深層情境勾勒了出來。例如 Mann 就能夠在資訊不全與存在各種可能性的情況下將其台面下的「財務」狀況抽絲剝繭地堆砌出來。至少在張家來說，「女性之間 (姑嫂、母輩與姊妹) 在財務的週轉上要比男性間來得更加地流通順暢」(第 176 頁)。她們的詩文中並沒有提到類似賣刺繡或字畫之類的情事，但這也說不上是什麼祕密。這讓她們「賺錢養家」的工作沒有蒙上任何商業色彩。凡嫁爲人妻的女性拿其私人免稅的財產——嫁妝，來貼補夫家家用，都會贏得很高的讚譽。

但是爲何男人並不太能夠養家呢？有些人即使很早就高中科舉，卻是英年早逝，張琦的兄長便是一例；而沒有順利考取功名的人，就要一邊養家活口一邊準備考試，這是非常困難的事。而這時的男人就比女人更有必要去嚴加看管其家產使之不致流失。而中國女性至少會看在從小就認識的情面上，彼此扶持。常州以女方家族爲中心的婚姻所以孕育出這種女性情誼，亦不脫是因爲家裡的姊妹與孀姨可以一起幫忙扶養家中的幼小兒女的關係。

Mann 選擇不去探究的其他的台面下的家務事有：性事、爭執與緊張關係（雖說仍可看到一些緊張關係的蛛絲馬跡，尤其是在張琦長子去世後棘手的媳婦問題上）。清末從來未有站上台面的女詩詞家出現過，這暗示清末的詩詞圈並不把女詩詞家的創作當作是文學傳承的一部份。但至少在張家的女詩詞家來看，她們的創作都是爲了所謂中國詩詞之「大傳統」(great tradition) 而做的。而女性詩詞一向有她們自己獨特的表達風格與女性主題，但這樣的風格主題到了清代就已漸漸不復所見。張縉英就採用原屬男性風格的詞體來從事創作，這似乎成了張家女性與眾不同的特色之一，而張縉英的妹妹張綸英其雄厚的男性書法風格就更不在話下了。她們二人的表現風格，都頗有乃父之風。我不確定「詞」是否可以說是用來抒發時局不平的詩體（第 125-126 頁），但「詞」一定是發展人際關係的重要基礎。

Mann 詳盡地翻譯和解說張家女性的詩作。她依照這些詩作的時空背景來做故事的鋪陳，而不具太多文學批評。她們的詩作不太帶有女性自覺，而 Mann 以爲，她們的詩作要是寫到像是纏足這類事情的話，是絕對無法被保存下來。Mann 似乎也意在表達中國女性爲了恪守婦德而無法寄情於詩文和學習，以致在相夫教子與文藝發展之間不斷掙扎的處境。湯瑤卿的父親與王采蘋的三姨丈孫劼（即湯瑤卿三女婿）都是相當保守且重視婦德的人，但是 Mann 並沒有特別去凸顯這種傳統兩性對立的關係，顯示女性主角人物對這種兩性關係了然於心。

當 Mann 在撰寫這部家族傳記時，不得不去試著摸索其主角人物內心的思想與情感，並顧及當時的社會背景。Mann 自承此書是沿襲了司馬

遷以來的紀傳史體例把人物故事編入歷史撰述之作。對 Mann 來說，創造新的敘事體裁或“recreating historical moments”的好處就在於可以更有條理地從斷簡殘篇中找出有關連性的事證。這種做法是行得通的。而依我之見，歷史學家與小說家的差異之處就在：當歷史學家在推想主角的對話與想法時，就會被迫回到歷史實事的「根本面」去進行分析。如此一來，就像 Mann 所說的：書中「場景的安排與結局都是虛構的，無史籍之據 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們的真實性可以在張家所留下來的無數資料記錄中得到印證」(序：xvi 頁)。Mann 書中故事的編排大多都做得十分恰當得體；而她鉅細靡遺的註腳，讓吹毛求疵的讀者可以知道哪個部份是推想出來的，且有何依據。不過，Mann 在很少的一些地方對資料的解讀，好像有些拿捏不準。例如，在重建一個路人熙來攘往的外景中，Mann 想像張縉英撞見一票風塵女子在外；她問身邊丫環她們在這裡做什麼；而丫環答道：「夫人，她們是出來看熱鬧的」(第 78 頁)。就跟整個事件是捏造的一樣，這種影射風塵女子的委婉對話很顯然就是 Mann 所捏造或「設想」出來 (第 245 頁，註 24)。但是我不免懷疑，張縉英要是有遇見過這些風塵女子，她應該早已知道她們的身份；而即使從未見過她們，她也不太可能會向丫環打探人家的身份隱私；而若她果真的問了丫環，她的丫環應該會比較直接地說出她們的身份。另外就是，Mann 把張縉英說成像是一個可以看見一切事情之「矛盾面」的人，但是很多的這些矛盾面是 Mann 自己才看得到的 (第 91 頁)。

不過，Mann 極少有這種拿捏不準的情形出現。此書所重建出來的地方，大多都能夠讓人物從其所處歷史背景當中活靈活現地呈現出來。Mann 將很多中國一般士紳家族裡日常生活光景呈現出來，譬如女眷要是能度過臨盆危機通常就會活得很久，而男人經常在外地奔走就容易感染各種疾病致死。江南地帶到處可見瘧疾與其他熱帶疾病的肆虐，但是上層社會的婦女則因深居大宅之故而常免於疾病的侵擾。

最後，Mann 表示，關心公民與國家之塑造的 20 世紀「新女性」，其得自於「才女」前輩的傳承，多過於她們本身所努力得來的部份。另一方面，進入 20 世紀之後，士紳家族自有的家學淵源就顯得陳腐不堪 (第

6 頁)，但是我們也不禁要問：何以 20 世紀「新女性」是「新」女性呢？(第 8 頁)。一如所見，士紳家族女性絕對不是女權主義的前身，但同樣她們也絕對不是一切都逆來順受。Mann 認為，中國女性在 19 世紀不會造成「問題」，因為 18 世紀爭辯不休的女學論戰由反對的傳統一方勝出，而 20 世紀女性在公共領域的角色問題則尚未浮出台面。將明清「才女」看成是只懂附庸風雅之弱女子的梁啟超，或許是第一位將女性議題拿到台面上探討的人。梁氏的批判並不公平也不具歷史依據，不過他的批判卻受當時人所認同(第 197 頁)。我認為，當我們往回看時，其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女性欠缺經濟獨立，也不在於女性取得學識地位與否，而是女性要走出閨房(而梁啟超對於這種女性自主一事的態度實際上有點自相矛盾)。

Mann 此書的最大優點之一就是它展現了張家女性嚮往政治的深層一面。她們讓古代女英雄人物再次引領風騷的政治詩，啟發了秋瑾等相類的女性。再說，第一代「新女性」人物，像是常州的陳衡哲(1890-1976)，至少接受過母輩傳統教育的薰陶。Mann 將太平天國與甲午戰敗看作是中國局勢的轉捩點。經過太平天國亂事之後，中國的氛圍迥異以往，一切也都顯得不同，縱使生還者仍企圖「回復」過去的一切。大部分的生還者失去了他們的家園和很多親人而變得比較人單勢薄——有的還跟王采蘋一樣頓失所有依怙。原本就承受著外界壓力的士紳家族，到了 1895 年就遭受環境巨變的衝擊了。

歷史學家能否把常州張家和常州特有的家傳女學當作是一般性的案例來處理，這很難說。由 Mann 所開創的這方面的未來研究，將會導向一個更豐碩的景象，但是 Mann 所重建的張縉英與其女性親友之風華世界，將難有人可出其右。